

“一带一路”建设化解产能过剩的实证研究

——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例

王月升¹ 刘 曦² 杜朝运³

内容摘要: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由于投资过度导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船舶等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其对化解我国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现状以及“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进行分析,并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分析方法探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出口、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购进价格指数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库存的影响,可以得出“一带一路”能够有效化解非金属矿物行业产能过剩的结论。

关键词: 一带一路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产能过剩 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052(2018)06-0015-07

DOI:10.16407/j.cnki.1000-6052.2018.06.002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概念,要求坚决去除低端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一带一路”建设集中在亚洲、非洲和俄罗斯,行业分布以建筑、铁路、电力等基建类项目为主,因此引发学界对“一带一路”化解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投资项目解读和产业关联分析,探究“一带一路”在化解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过剩中的作用,认为其有利于转移国内已有的产能,同时输出资金、人才和技术以限制国内产能扩张速度,因此有利于缓解我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产能过剩现状。

一、“一带一路”建设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研究

目前,“一带一路”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研究,已引发各界的普遍关注,学界对于通过“一带一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多持肯定态度。熊艾伦等(2015)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构建一个建立在产业级差之上、通过要素流动和市场拉力来缓解产能过剩的机制,因其拥有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西部地区可在该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郭楠(2016)认为: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可视为我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创新投资的关键途径。于鑫等(2017)从产业转移角度探究“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产业转移的作用,认为其有利于缓解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可以加深国际合作,并为航运、装备工业提供产业转移机会。部分学者结合现状,通过借鉴其他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如刘建江(2015)提出借鉴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化解产能过剩的经验,认为我国应当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制度创新、完善市场调节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研投入、扩大有效需求、实施“走出去”战略。高晓娜(2017)介绍了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阶段和现状,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要求采用多元化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企业退出机制、鼓励本土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调节

收稿日期: 2018年11月6日

作者简介: 1. 王月升, 泉州经贸学院经管系副教授。研究方向: 金融经济。泉州, 362000。

2. 刘 曦, Brande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研究生。研究方向: 金融经济。泉州, 362000。

3. 杜朝运,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泉州经贸学院院长。研究方向: 金融经济。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网络变迁与普惠金融发展研究”(批准号18BJL0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入分配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加快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此外，部分学者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对化解产能过剩将产生积极作用。程仕英（2016）研究了“一带一路”对我国过剩产能的经济效应，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转移我国的过剩产能、改善产业结构，并对国内就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史恩义（2017）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加权平均计算各省市产能利用率，发现全国各省市均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而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转移过剩产能。刘瑞（2017）也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应对我国产能过剩的较优方案，但不能完全放弃产品出口贸易。

我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化解产能过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钢铁行业。如胡想相（2017）指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钢铁行业产能转移有助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对中国有助于促进资源开发、化解过剩产能、推动合作建设和整合行业资源。杜博（2017）研究发现：中国钢铁行业相比于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钢材出口、消耗库存，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对同样存在产能过剩的水泥行业的影响。刘淑娟等（2015）认为“一带一路”能带来大量需求，有效刺激水泥消费，并解决新疆、内蒙、宁夏等地区的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但同时不能低估风险，如水泥不易运输、海外消费对化解国内产能作用不大、水泥需求不会爆发性增长等。

虽然学界对“一带一路”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缺少定量研究；且研究集中在钢铁行业，对其他相关行业涉及较少。本文以同样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问题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例，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预测各相关因素变动对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发展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主要包括：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制品制造；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玻璃及其制品制造等。从工业销售产值的角度，截至2013年2月，以上三类产品占总产值比重达到70.85%。除砖瓦石材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不可考，2014年及以前，全国水泥产能利用率均在70%以上，但2015年以来明显下降，2016年为68.7%，2017年受环保、错峰生产等多重因素影响，产能利用率进一步降至65%。2017年瓷砖行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4.47%，耐火材料行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0%，石墨电极行业产能利用率约为64%，2018年10月浮法玻璃产能利用率约为72.5%，全部低于国际上79%的产能充分利用标准。

自2015年以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全面推行去产能工作，落后、多余的产能或被淘汰，或主动停产。2016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开始复苏，2017年行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年10-12月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2.2%，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1%，2017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为70%，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2018年第三季度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为71.3%，相比去年同期下降0.3%。2018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主要由于占全行业比重较大的水泥行业人为限产后产能利用率的下降。

产成品存货的变动被学界普遍用为替代产能利用率、衡量产能过剩的指标之一。当行业中出现产能过剩时，首先会表现为产量过剩，随后企业库存积压滞销，产成品存货显著增加，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下降，进而出现产品价格下跌，最终影响全行业的盈利，因此产成品的存货变化可以用于反映某一行业产能过剩情况。从总量的角度，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库存从2012年起逐年增加，2015、2016年增长基本停滞，2017年进一步创下新高，存货量年内波动存在一定周期性，通常在年初达到库存低点。从同比增长率的角度，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在2014年6月触顶，库存增长速度达到17%，2015年开始回落，2016年首次实现产成品库存的负增长，2017年库存增速出现回升，如图1所示。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存货的变动与全行业的发展情况相匹配。2014年，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显现，库存增速达到顶峰。2015年政策上开始下达去产能要求，库存增速随之下滑，但库存量仍在增长。此后受到供给侧改革、环保限产等多方面的影响，库存量首次出现减少。随着2017年周期性行业出现复苏，库存量又相应出现增长，但此时的增长速度已经控制在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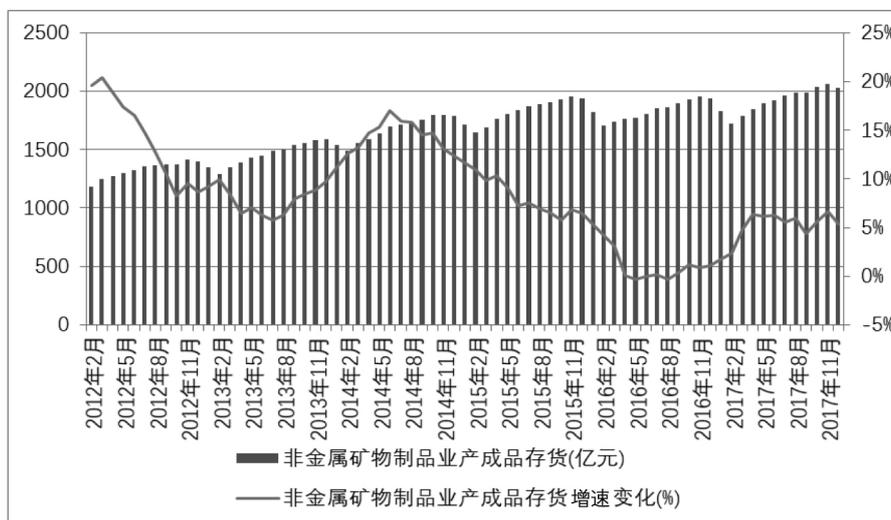


图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存货与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布局及对去产能的意义

截至2018年10月24日，BHI中国拟在建项目网共收录“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重点项目1878个，其国内494个，国外1384个。国内重点项目包括交通运输、建筑、生态休闲旅游、电力、机械电子、市政公用、化工医药等，在最近收录的200个国内重点项目中，以交通运输类型项目数量最多（88个），其次为建筑类项目（21个），二者合计占到项目总数的54.5%。国外最近收录的200个重点项目中，电力项目占61个，交通运输项目40个，建筑类项目30个，占比65.5%。可见，基建类项目如交通运输、电力、建筑等项目的数量在总项目数量中占较大比重，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期，随着这些项目在未来逐渐开展，将会增加对上游产品的消费，进而消耗库存。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采用产业关联分析来验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品的拉动作用。

我国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产业的发展情况会同时受到上游供给和下游需求的影响，同时某一个产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需求和供给。后向关联分析主要反映被研究产业的变化如何影响上游产业的需求，而前向关联分析反映了下游产业的变化对被研究产业产生的影响，产业间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通常使用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进行测度。

表1 相关行业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

行业	直接消耗系数	行业	直接消耗系数	行业	完全消耗系数	行业	完全消耗系数
1. 建筑	0.194	6.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0.016	1. 建筑	0.270	6.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0.045
2. 仪器仪表	0.029	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0.015	2. 仪器仪表	0.070	7. 交通运输设备	0.043
3. 电气机械和器材	0.027	8.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0.011	3. 电气机械和器材	0.068	8. 金属制品	0.042
4.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0.025	9. 交通运输设备	0.010	4.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0.048	9. 通用设备	0.040
5. 其他制造产品	0.016	10. 金属制品	0.010	5.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0.047	10. 其他制造产品	0.04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前向关联效应的角度，根据表1直接消耗系数可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直接受益于建筑业、仪器仪表

业和电气机械和器材业的发展，其中建筑业比重最高，达到 19.45%，说明建筑业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产品消耗最大，因此充分体现其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直接拉动作用。从完全消耗系数来看，建筑业也是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拉动作用最大的下游行业，完全消耗系数达到 27%，可知建筑业的发展最能够有效增加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品的需求。此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的发展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带动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品的消耗，而这些行业正是“一带一路”国内外项目中数量上占比较大的行业。因此，“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将促进建筑等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将有效增加对上游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品的需求，从而达到去除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现有库存、提高产能利用率的目的。

除了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来增加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产品需求，“一带一路”建设也通过增加相关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帮助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近十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高速增长，从 2007 年的 265 万美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1961 亿美元。从 2013 年起，多个工业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出现明显增长，如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这些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增长是由于大量的国外“一带一路”项目需要本国企业以参加资本、开办合资企业、并购外企或开设子公司的形式展开，即进行资本输出。由于资本输出将用于建设国内新增产能的资金转移到了国外，因此有利于抑制我国新增产能增长。此外，可以预期与资本一同输出的通常也包括设备、人才、技术等，这些我国现有产能的组成部分也将以“一带一路”为契机转移到国外，进而实现对我国现有产能的转移。因此，通过促进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一带一路”能够有效转移我国资本、设备、人才和技术，抑制国内新增产能，并转移相关行业现存的过剩产能。

四、中国产能过剩数据变量与 VAR 计量模型构建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完整的产能利用率的统计和计算体系，仅有统计局偶尔公布单独年份或季度的工业产能情况和产能利用率，并无连续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可查。本文重点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尤其是 2015 年以后，我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过剩及其化解情况。为了取得更加连续和详尽的数据，建立可靠的产能过剩分析模型，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相关变量月度数据的基础上。由于缺乏用于计算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的原始数据，难以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进行精确测定，因此选择产成品库存作为研究产能过剩的替代指标进行分析。使用该指标的原因在于：如果出现了产能过剩，市场上将首先出现供过于求，累计库存、压制价格，最终导致企业利润下滑；当产能过剩情况得到了缓解和消除，又会出现供不应求，开始消耗积累的库存；当库存低于一定水平，企业会增加生产补充库存，跟上需求，此时会提升对已有产能的利用率。由此可以看出：产品库存的变动情况，对产能过剩的反应更加迅速和直接，有助于灵敏地反映产能过剩的变化情况。

因此，我们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产成品存货总额作为变量之一，用 inv 表示，代表产能利用情况。其他相关变量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出口额 ($export$)、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ofdi$)、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 ($prog$)、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购进价格指数 ($price$)。通过构建包含上述变量的指标体系，能够比较深入分析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建设和成本变动等相关因素对我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情况的影响。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出口额、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三个变量，直接受到“一带一路”的影响；而非金属矿物购进价格指数变化情况，能够反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成本变动，并可用于研究成本增加对库存累积情况的影响。

我们的数据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网站公开数据，时间跨度为三年，即 2015 年 2 月至 2017 年 11 月。我国公布的工业数据大多缺失 1 月份数据，对缺失数据我们取上下两个月的平均值进行估计。同时，由于行业或宏观数据变动往往存在一定周期性，年内波动较大，为避免季节性增减导致原数据或环比百分比的偏差，进而更好地反映不同年份的行业数据变化情况，所用数据采用同比百分比加一形式代入模型。

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在实践中有时把一组相互影响的变量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考察，以此分析特定变量对预测其他变量未来变化影响，或用来研究一个变量受到冲击后在系统中的其他变量会发生何种变化。通过把所有变量看作一个整体，对其进行整体分析，能够获得给出的变量是否具有同等地位，有利于进行更深入研究，并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指标对相关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影响。

本文引入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模型), 探讨“一带一路”建设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情况的关系。VAR 模型是一种不依赖具体经济理论而建立的多变量时间序列模型, 主要是把各个变量的当期值作为因变量, 并选取若干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在该模型框架中, 所有变量具有同等地位, 相关变量的动态关系通过滞后变量进行描述。研究过程包括: (1) 单位根检验, 只有在所有序列均为同阶单整条件下, 才能够建立稳定的 VAR 模型, 并得出可靠的分析结果; (2) 确定滞后期数, 使用 LR, FPE, AIC, SC 和 HQ 准则相互比较验证得出最佳滞后阶数; (3) 稳定性检验, 使用 AR 根检验判断 VAR 模型是否稳定; (4) 脉冲响应分析, 研究不同指标的变化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存货变动的冲击情况。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结果表明,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出口额 (export)、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 (prog) 自身平稳,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存货 (inv)、非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 (ofdi)、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购进价格指数 (cost) 分别经过一阶和二阶差分处理后显现平稳, 因此, 可以利用以上数据建立稳定的 VAR 模型。

在确定模型滞后阶数时, 常用的方法包括 HQ、AIC、LR、SC 和 FPE 方法。当 SC 和 AIC 准则出现背离时, 可以采取 LR 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根据表 3 所示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本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为 2。

最后, 对向量自回归模型平稳性进行检查。如果所有的根的模大于 1, 即倒数小于 1, 说明该模型稳定。根据图 2 所示, 该向量自回归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落在单位圆内, 说明该模型数据满足稳定性条件, 因此可以用于构建 VAR 模型。

表 2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t - Statistic	Prob	结论
inv	-2.709673*	0.0834	不平稳
dinv	-4.129927***	0.0031	平稳
export	-3.251564**	0.0257	平稳
ofdi	-1.132356	0.6910	不平稳
dofdi	-5.137775***	0.0002	平稳
prog	-3.788741***	0.0070	平稳
price	-0.483423	0.8818	不平稳
dprice	-1.946456	0.3079	不平稳
d2price	-6.484084***	0.0000	平稳

注: ***代表在 1%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5% 水平下显著, *代表在 10% 水平下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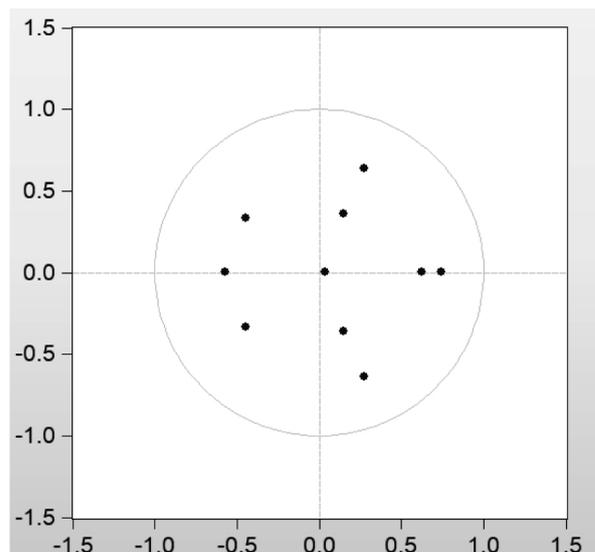


图 2 VAR 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表 3 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34.68483	NA	8.88e-8	-2.047230	-1.811489	-1.973399
1	88.08537	84.70430	1.29e-8	-4.005888	-2.591444*	-3.562902
2	128.1088	49.68420*	5.43e-9*	-5.041983*	-2.448836	-4.229842*
3	146.9761	16.91557	1.35e-8	-4.619043	-0.847193	-3.437747

五、“一带一路”化解产能过剩的脉冲响应分析

VAR 模型是数据导向型的建模过程, 模型中参数可能并不具备明显的经济意义, 因此要对参数做出合理的经济解释有时存在困难。在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时, 往往需要考虑某个变量的扰动项变动及其对本身以及系统中的其他变量影响情况,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脉冲响应分析是指给某个变量

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代表该变量发生的某一方向的变化，然后分析这一变化对其他内生变量在未来产生的影响。由于变量之间相互联系，当其中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就会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而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视变量的特点而定。图3为VAR模型的脉冲响应曲线，反映了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export）、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prog）、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购进价格指数（price）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成品库存（inv）的影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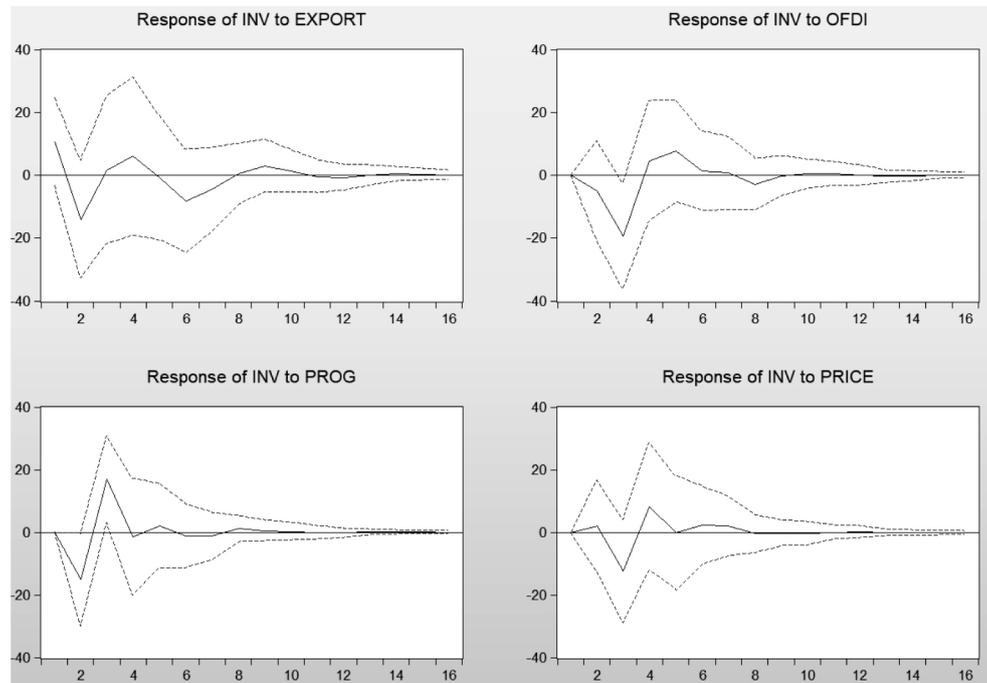


图3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

根据脉冲响应曲线，可以看出在短期内，各变量的正向冲击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产成品库存均有较大影响，且影响存在双向的波动。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的增加会首先导致产成品库存由增加转为减少，在第二个月减少最多，第三四个月有所反弹，继而出现进一步的减少，随后反弹力度减弱，对产成品库存的影响在第十个月以后逐渐收敛至零。由此说明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的增加，可以在短期内减少非金属矿物制品库存，但其作用在中长期很不稳定。出现反弹主要是由于企业响应出口需求的增加而扩大生产导致的产成品存货增加，但几次反弹力度在时间和数量上均小于存货的消耗，在反弹后，由于产品得到应用或产品知名度的提升带来的需求增加，存货量往往会进一步减少，从而达到去库存的作用。从产能角度分析，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出口为积累的库存和过剩的产能提供了释放的机会，面对出口需求的增长，企业会首先通过增加对现有产能的利用来增加产量，使实际利用产能与现存产能之间的差异减小，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因此得到提升。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对非金属矿物制品库存的影响更显著地体现在短期，可以看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库存在第二、三、四个月出现显著的减少，并在随后几期增加，到第八个月库存再度减少，在第十个月后其影响趋于零。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会立刻消耗现有库存，虽然在后期库存稍有增长，但总体上体现为对库存的消耗。反弹力度较小的原因是，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伴随资金、设备、人才和技术等的对外输出，这些正是我国现有产能的主要组成部分，导致国内现有产能减少，因此后期增加生产补充库存时不会出现库存的显著增加。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影响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相类似，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是指报告期完成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作量，因此该冲击反映的是前期完成的营业额对后期的影响。由图3可知，在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增加后的第二个月，非金属矿物制品产成品库存出现显著减少，第三个月转为显著增加，且库存增加力度大于减少的力度，因此反映了前期营业额增加首先带来的是对后期库存的消耗，随后期间库

存的增加来自于企业增加生产补充库存，与出口后企业补库情况相同，此时的库存增加来自于对现有产能更加充分的利用，因此有利于增加产能的利用率。该冲击在第四个月以后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已完成工程营业额对库存的影响主要作用在短期。

最后，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购进价格指数提高，即生产成本提高，将在短期首先增加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库存，第二、三个月时则表现为库存的消耗，第四个月以后库存出现增加，第八个月后该冲击的影响逐渐弱化。成本提升对库存总额的影响一部分是由于会计记账方式将成本的增加体现在库存总额中，同时企业在成本增加时倾向于减少生产，因此第二、三个月里总库存会加速消耗，在后期补库时，成本的增加也部分导致了库存总额的增加。此外，在实际情况中，存在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通常议价能力较差，当面临成本增加时，企业无力将成本转移到产品价格，风险抵抗力较差的企业容易遭受损失甚至停止经营，反而积累更多库存，此时较大规模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但也往往会面临严重亏损。

六、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目前，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存在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而“一带一路”国内外项目主要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组成，在产业关联作用下，能够有效带动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品的消费，增加出口，消耗现有库存。此外，“一带一路”能有效增加相关行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增加，实现资本、设备、人才和技术的对外转移，达到抑制国内新增产能、转移国内已有产能的目的。因此，“一带一路”能够有效化解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几个变量均对产成品库存存在双向的影响。非金属矿物制品出口和成本的增加会首先增加企业的产成品库存总额，随后库存出现加速消耗，在冲击后的第三、四个月企业会增加生产补充库存，从而提升对现有产能的利用率。而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则首先减少库存，在后期补库时产能利用率同样有所增加。总之，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出口额、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购进价格指数的正向冲击均有助于消耗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库存，提升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一带一路”作为联系亚洲活跃经济圈和欧洲发达经济圈的重要纽带，为化解我国现存的产能过剩提供了便利。然而，由于沿线国家联通程度不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经营经验不足、项目开展存在多方面的风险，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沿线国家无障碍联通，取长补短，实现共同效益最大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程度不一、难以实现通信和运输完全联通的背景下，很难进一步开展贸易或技术上的合作，因此首先要加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统一标准，对接各个国家技术标准和实际施工参数，通过合理规划、协商和施工，解决不同国家之间包括货物流通管理、信息系统等差异带来的问题，避免因制度或标准不同导致的拖延和无谓损失。其次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是一项规模大、周期长的国际工程，从基础设施建设出发，是为了实现未来更深入、更具体、在更高技术层次上的合作。最后，在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制定上，应考虑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已有资源，通过产品、资本、人才和技术的转移，使各国已有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二）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市场逐渐联通，各国企业共享发展机遇，企业的发展目标不再限于国内，而是着眼全球市场。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企业影响力、获取更多发展机会、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建立成熟的管理体系。“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与沿线国家的互惠合作机制，形成发展共同体，为沿线国家企业提供了接触、交流和合作的机会，我国作为“一带一路”主导国家，更应当鼓励我国企业抓住机会，积累国际合作经验，迈向国际市场。首先，政策上应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应的制度便利，落实鼓励措施，起到切实的激励作用。其次，应当为企业拓展海外业务、进行技术开发、提升管理水平提供税收便利、资金支持和交流平台，提升研发水平和管理水平，为“走出去”做充分准备。第三，我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但在国际市场中的经营经验仍十分欠缺，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仍旧不足，因此应引进先进人才，学习已有跨国企业在内部控制和外部经营上的经验，改善企业组织结构，建立企业文化，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并增加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以此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企业在境外经营的成功几率。

（下转第38页）

- [2] KRUGMAN P. Adjustment and growth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Lessons of Massachusetts for EMU [M]. Adjustment and growth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1 – 420.
- [3] BAXTER M, KOUPARITSAS M A.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Co – movement: A Robust Analysi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4, 52 (1): 113 – 157.
- [4] 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2003, 86 (86): 723 – 734.
- [5] IMBS J. The real effects of financial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68 (2): 296 – 324.
- [6] PRADUMNA B. RANA. Trade intensity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the cas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J].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08, 53 (02): 279 – 292.
- [7] INKLAAR R, JONG – A – PIN R, HAAN J D.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in OECD countries—A re – examination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8, 52 (4): 646 – 666.
- [8] 麦延厚等. 中国 – 亚太经济周期同步性的传导机制研究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5 (3): 143 – 159.
- [9] 陈磊, 张军. 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 (3): 95 – 111.
- [10] 麦延厚等. 中国 – 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7 (8): 19 – 32.
- [11] CERQUEIRA P A, MARTINS R. Measu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using a panel approach [J]. Economics Letters, 2009, 102 (2): 106 – 108.
- [12] LOVE I, ZICCHINO L.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dynamic invest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anel VAR [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06, 46 (2): 190 – 210.

(责任编辑 翁东玲)

(上接第 21 页)

(三) 提升风险防范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律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对项目顺利开展的限制因素较多，可能会导致项目受阻、工期拖延等问题。在部分国家还可能存在着地缘关系紧张、腐败严重等风险。因此，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商争取项目所在地政策和制度上的便利，在确保项目符合所在地法律规范的同时，最大程度上为项目实施提供便利，同时也可积极借助亚投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争取资金上的支持，确保项目能够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参与项目的企业应对多种风险进行评估，明确项目的区位条件、合作方式、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等，明确自身风险承担能力，从而预防和抵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一带一路”项目普遍投资金额大，资金回收周期长，因此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和金融风险，企业应严格监控前期项目进度和后期资金回收情况，达到控制项目投资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熊艾伦, 蒲勇健, 张勇. “一带一路”与产能过剩转移 [J]. 求索, 2015 (12): 75 – 79.
- [2] 郭楠.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J]. 经济研究参考, 2017 (6): 33 – 34.
- [3] 于鑫, 王菊, 沈志渔.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与挑战 [J]. 现代管理科学, 2017 (5): 27 – 29.
- [4] 刘建江, 罗双成, 凌四立. 化解产能过剩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J]. 经济纵横, 2015, (6): 111 – 114.
- [5] 高晓娜. 我国产能过剩的典型事实、成因以及治理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17, 39 (6): 7 – 12.
- [6] 程仕英. 我国产能过剩投资“一带一路”的经济效应分析 [D]. 太原: 山西财经大学, 2016: 1 – 54.
- [7] 史恩义, 吴彦榕. OFDI 化解产能过剩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J]. 现代经济探讨, 2017 (10): 46 – 53.
- [8] 刘瑞, 高峰. “一带一路”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6 (1): 45 – 56.
- [9] 胡想相.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钢铁业产能过剩转移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7: 1 – 65.
- [10] 杜博. “一带一路”与中国钢铁出口贸易发展研究 [D].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1 – 36.
- [11] 刘淑娟. “一带一路”将适度缓解国内水泥行业产能过剩 [N]. 中国建材报, 2015 – 06 – 01 (003).

(责任编辑 凌霄)